

内 容 提 要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今后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不断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的一条强国之路。

本文主要论述了：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而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社会主义的活力更增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能充分发挥，所以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改革之路，所以能取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三、形成了多层次的有重点的开放格局，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四、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当前特别要反对右的倾向。只有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方向，改革开放在九十年代才能发展，才能取得更巨大的成就。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新中国建立后4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面对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心意，适合生产力发展，促进我国繁荣富强的一条强国之路。

一、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开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一方面打破了我国生产力长期处在停滞、缓慢发展的状态，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新的活力，工农业生产形成了大幅度增长的局面，促进了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有计划的产品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的转化，促进了我国封闭型的经济向开放型的经济转化，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活力有了明显的发挥与增强。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地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先后胜利地完成了“六五”、“七五”计划，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

十几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粮食总产量先后登上了7000亿斤、8000亿斤两个台阶，1990年达8700亿斤。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突起，使非农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1990年已达54.6%，这不仅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国境的道路。

十几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工业生产迅速增长。钢、煤、石油、发电量等1990年与1980年相比，钢由3712万吨增加到6604万吨，煤由6.2亿吨增加到10.8亿吨，石油由1.06亿吨增加到1.38亿吨，发电量由300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6180亿千瓦小时，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这不仅使我国的工业体系更加完整和巩固，而且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开发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不少产品和产业已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贸易有了大幅度增加，从而加快了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更新改造的步伐。在1980—1990年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7万亿元，超过前30年的总和，有1000多个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1990年与1980年相比，进出口总额由381亿美元增加到1154亿美元，增长两倍以上。

在十几年中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在改革开放中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工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十几年改革开放，促进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明显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4470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7400亿元，增长1.3倍，平均每年增长9%。国民收入由1980年的3688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4300亿元。城镇居民收入1990年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138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30元。

总之，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推动力。没有改革开放要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上述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也促使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体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已形成了新的格局，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为九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改革之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引下，设计了一条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后社会体制的改革；先特区的开设，后全面的开放等一整套的有层次、分步骤改革开放的道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体经历了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在这五年中，改革的重点在农村。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持续多年的大增产，同时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了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地搞上去。要贯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逐步地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决定（草案）》中规定：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超奖。”在贯彻上述决定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束缚，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很快在不少地方的农村社队中恢复了合作化时期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开始了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尤其是安徽、四川等省，生产责任制推广更快。但是，包产到户的作法，一方面受到农民的欢迎，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引起了社会的议论，有些领导机关把群众中实行的包产到户作为搞单干，发展资本主义加以纠正。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斗争。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从当地具体情况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①这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农村生产队搞责任制的问题。于是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支持和倡议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了，其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党中央为了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及时的正确的政策，派出了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到十几个省进行调查。

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议认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础。当前应当把改善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作为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下苦功夫，抓紧抓好；两年来，各地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类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特别是出现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些形式都得到了农民的欢迎，应加以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都要从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经营形式、各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应适应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生产队也有灵活性。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和收入的各种形

式，都应支持推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的包各业。其原则是方便生产，有利经营，分别到组、到户、到人。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减产分别奖罚，以合同形式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各地根据群众自愿，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地推广，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稳定下来；要充分发挥小手工业、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和小商小贩的作用，创办社队企业和集体副业，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者也可批准他们外出经营。

可见，会议肯定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否定了过去在农村政策上的“左”的错误，于是各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到1980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50%。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明确指出，生产队要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和生产习惯，推行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队、组、户、工。11月，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又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坚持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要求各地根据这两个不变的原则，指导农民因地制宜地改进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为了总结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中共中央于1981年12月举行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纪要。于是全国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全面地发展起来。从南到北，兴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农、林、牧、副、渔各行各业都开始了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由于生产责任制性质的明确规定，使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纳入到有领导有计划的轨道。到1982年6月，全国有86.7%的生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充分的发挥，农业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对此，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了总结。认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实行了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它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管

理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然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实际。这是在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99.96%的生产队实行了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在全国形成了2482万个专业户和重点户。从而极大地解决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产品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1984年农业总产值为3612亿元，粮食产量8146亿斤，棉花为625.8万吨。农业总产值自1979年以来每年以7.5%的速度前进，创造了建国以来农业生产发展最快时期。这充分说明我国第一阶段的改革是十分成功的。它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找到了一条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和确立了一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即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之前。在这三年中，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并全面地开展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最近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全会一致认为，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在会上陈云作的书面发言中说：“1981年我曾说过，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对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陈云的发言一针见血地说出了这次改革的实质和深远意义。正是这样，在决定中充分论述了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指出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作用，在改革中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

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技术交流；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制定，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性质、任务和基本政策，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也促进了科学技术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同时也迫切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第二阶段的改革中，取得较快进展的主要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由单一的公有制发展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如在工业总产值中，从1978年到1988年，全民所有制经济从80.8%下降到64%，集体所有制经济从19.2%上升到32.6%。到1988年底，城乡个体户有1455万户，从业人员有2305万人，以及还有各类外资经济，共增加到2.4%。在企业方面，由过去的统的过死，统的过多的情况下转向有相当的自主权。如企业留利，改革前不到5%，改革后的1987年已达45%。从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入手，推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搞活了企业。1988年底，已有90%的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同时在企业中还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工人合同制，以及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工资制。在市场方面，冲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念，形成了农副产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也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

从而在这第二阶段的改革中，使我国旧有的僵化、封闭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开始受到触动，逐渐向具有活力的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转化，从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发展的生机。

第三阶段，即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到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一年的时间中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进行全面的改革，而且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全党的日程。

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神州大地上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继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变后又一个深刻的转变。这一改革，不仅将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将作出巨大的贡献。因此，党对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慎重的。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了10年的准备，才提交党的十三大讨论通过的。在10年中，一方面总结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弊端，得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试点，探索了改革的内容和重点，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邓小平是这场改革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自1975年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谈话和指示，对各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十分确切的估计和科学的论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和原则。他在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内容、改革的目的和要求、改革的实施部署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抓住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设计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他的这个讲话已被全党接受，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1980年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大规模试点。从而到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能系统地提出改革的任务、目标、性质、内容、步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正确思想和原则。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始，使我国从政治到经济，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企业到党政机关都处在改革之中，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因而这场改革必然涉及到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干部等各个方面的权益关系，撞击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传统等领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将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并使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有一个全面的发展，并日益完善和成熟起来。

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失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事业，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要完成这项事业，困难是很大的，想寻找一条铺满阳光和鲜花的道路是没有的，从时间上说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改革中也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会遇到各种新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在客观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改正错误，把改革引向胜利。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

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更高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对生产力的发展是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的，无需改革。但是，我国具体的领导体制，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根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三大确定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些是业已成熟的问题，必须切实解决。不然会严重阻碍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高度的统一的集权型政治体制向统一的民主型政治体制转变是党的十三大以来兴起的又一个历史性转变。实现这转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需要逐步积累和完善，同时也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们政治思想文化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没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人民政治文化水平还较低，又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要一下子建立起民主型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还必须制定远期的目标。

第四阶段，即从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党中央制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和决策，使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治理整顿和改革并举的时期。

所以采取治理整顿和改革并举方针，主要是由于在这前十年的改革中，只注重了改革，而不注重对右的或“左”的错误干扰的排除；只注意了改革开放的主体工程，而不注重经济环境和秩序；只注重经济发展，而不注重政治的要求。因而出现了改革中的急于求成，发展中的严重失控，政治的淡化，干部中的腐化，具体表现在：

第一，经济建设规模过于庞大，经济过热严重，总量失衡，通货膨胀，人为地造成

了社会总需求远远大于总供给，货币发行太多。从1984年第四季度后出现经济严重“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1984——1989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这就造成了连年财政赤字。1984—1988年共累计赤字254亿元，银行信贷总额累计2000多亿元。为弥补这些赤字，大多靠增发货币。1983年底社会货币流通量为530亿元，到1988年底已达2134亿元，在5年中发行货币1604亿元，每年平均增长32.3%，其中1988年就增发货币680亿元。这必然引起货币贬值和物价大幅度增长，1988年底通货膨胀率达18.5%。出现了空前的全国规模的抢购风潮。于是，不得不采取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

第二，工农业比例失调。我国工业从1984年到1988年的5年中，增长速度过快，平均每年为17.8%，大大超过了“七五”计划平均每年增长7.5%的要求，而农业却处在相反状态。自1984年大丰收后，由于指导思想上对农业形势估计乐观，对农业发展重视不够，投入少，农田基本建设削弱，农副产品价格严重不合理，过分强调乡镇企业，农业上劳动力转移太快，这就出现了农业生产连续徘徊状态，粮食总产量始终在8000亿斤上下，1985——1988年，农业平均每年增长率只有4.1%，远远低于工业。而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农业不好，工业必然受影响。所以到1988年不得不采取调整方针，对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加以控制。

第三，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党政干部中腐败作风蔓延。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司，大大小小的“官倒”严重地扰乱了改革的秩序。尤其是流通领域中资产阶级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这必然加剧通货膨胀，使人民难以承受。1986年底全国有公司18万多家。到1988年底已有29.9万家。其中70%是专门从事倒卖的商业性公司。这就造成了商业层层倒卖，价格直线上升。尤其是“官倒”更为严重。这必然出现贪污行贿成风，社会分配不公，社会风气败坏，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引起强烈不满。

第四，指导上的失误。对于经济过热现象，缺乏足够认识，对于工农业发展失调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对于通货膨胀缺乏正确的对策和措施；对于“官倒”和腐败不加坚决制止和处理。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情况下，企图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在价格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企图绕过价格改革进行体制改革，但这企图失败后，在不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又急于求成地进行价格改革，则必然加速抢购风潮的到来。1988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认为，我们有条件冒很大的风险全面改革物价

和工资。这就出现了经济改革中带有全局性的失误。再加上管理上，削弱了国家在计划、财政、银行、外贸等各方面的宏观控制，从过分集中走向了过分分散，则加剧了经济环境的恶化和经济秩序的混乱。

于是，1988年9月，党中央及时地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的方针。

从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七中全会的一年多时间内，主要工作的中心放在治理和整顿上，从而得到了人民支持，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国民经济逐步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为“八五”计划的实施作了充分的准备。

总之，在十几年的改革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改革之路。所以尽管在改革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失误，但是改革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改革中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全国人民是支持和拥护的。

三、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它把我国长期以来封闭型的或半封闭型的经济转向开放型的经济，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扩大了我国对外的经济贸易，吸引了外资，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所以对外开放政策是适应时代潮流，顺乎人民心愿，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好政策。

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趋势。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出了一国的界限，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明，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在这种形势下，对外开放有利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本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引进资金、先进技术、人才、信息，可以在建设中少走或不走弯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期实行封闭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的方针，开始逐渐地向开放转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有重点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首先是从设立经济特区开始的，这是第一步的决策。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对这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在财政上试行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办法，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搞试点。1980年8月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一步，起窗口的作用。在特区内吸收和利用外资，生产外销产品，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经过几年努力，特区的发展十分迅速。到1986年四个特区共开发建设用地60平方公里，有1200多家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开工投产，工业产值达75亿元，1987年达112亿元。

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行政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二步决策。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的特区后决定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但这些地方不叫特区，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8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形成了会议纪要。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同意提出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增强对外开放的活力。这14个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市等。在这些城市中，扩大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放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对外商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可以划出一定的区域为对外的新技术开发区。这些政策的采取，使这14个沿海城市在引进外资和技术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三步决策。1985年1月，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决定这三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包括城市和农村一起对外开放。这三个地区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花果之洲”之称。但在封闭的时代经济发展缓慢，为加速发展，中央决定把政策进一步放宽，把经济搞活，使这三个地区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要求这三个地区建立内外结合、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产品，增加创汇能力；努力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推动全国科技的进步，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学习国外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经验，创造适合我国情况的新的经营管理方法。

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时，我国的对外开放已形成了有5个开放特区，14个开放城市、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个三角洲、1个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亿多人口的沿海地带。这个多层次的、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开放政策的一个巨大成绩。它不仅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带动和影响了内地的开发工作迅速进行。

除设立特区、开放区、开放城市外，我国在外交、贸易、文化交流、科学技术等方

面也都执行和体现了开放政策，从而也促进了各方面的发展。

总之，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对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所以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至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到那时，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因为：“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②

对外开放和闭关自守是对立的两种政策。前者不仅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证明，而且也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甚至被明清以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政策，而后者是行不通的。现在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都是不行的。什么事情都必须从头做起这就太慢了。中国吃过这些苦头。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与苏联和东欧等国家有来往，而以后又关起门来，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当前的世界潮流，已是开放的时代。如果怕资本主义，再来个闭关自守，那么，50年中我国要接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长期坚持和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四、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国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反复地证明，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不然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所以改革开放中必须开展反两种倾向的斗争。

一种是站在“左”的立场上，反对改革开放，或者思想不能解放，右倾保守。所以，在1978年前后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扫除改革开放中的阻力是十分必要的，不然改革开放是难以进行的。同时改革开放在人民的利益上也是一次重新调配，得利者与失利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一种是站在右的立场上，借改革之名，利用开放之机，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在改革开放中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为使改革开放正确进行，党中央和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改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必然迷失方向，犯右的错误。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中，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思想更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活力；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因素也会大量地涌出来。私营经济会急剧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会迅速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泛滥起来。这一切反映到政治上，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一场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党内必然有不少党员干部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改革开放也是对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因此，党内必然有不少干部在商品经济思想的刺激下，利用改革的机会，争夺个人的私利。因此出现了一部分干部腐败的现象。

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行，对开放中的腐败行为，必须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作风，在开放中会渗透进来，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处理。对干部中借开放之机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开放政策的正确实施，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党的方针政策上有失误，或有右倾错误，党内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就会严重地发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既有过不敢改革开放的错误，也犯过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既出现过停止不前，不愿改革的状况；也出现过突击进行，企图一朝成功的做法；既出现过过分强调中国国情，不愿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也有过盲目引进，崇洋媚外的错误。但是，这十几年来中主要存在的还是改革开放中右的倾向。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可见，要进行改革开放，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倾向斗争。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之路是一条光明之路、成功之路。所以它必然成为90年代制定与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要在总结80年代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改革不断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肯定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会取得更巨大的成就。

注 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275—276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67—68页。